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一八期 ——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311b)

【春秋史笔】	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驳李捷兼下战书	高文谦
【史实辨析】	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	尹曙生
【史海钩沉】	华国锋奉周恩来之命调查李震事件	李海文
【亲历者言】	“文革”从华东局开始的三件史事	唐荣智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春秋史笔】

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驳李捷兼下战书

• 高文谦 •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一文。文中指责我“像位徇私枉法的历史判官”丑化毛，给我扣了一堆帽子，诸如“多处罔顾历史事实”，“有意混淆是非曲直”，“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等等，不一而足。李文发表后，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官方网络水军也一拥而上，对我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还鼓动毛新宇“追究高某的法律责任”。

李捷这篇批判文章显然是衔命之作。十年前，我撰写的《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把官方史学神话戳了一个大窟窿，令当局极为难堪，但又不便公开批判，只好用笔名“司马公”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我随后在《当代中国研究》发表文章进行反驳，围绕党史和文革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与之论战，澄清历史真相，驳得官方招架不住，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去。

为什么现在官方又旧话重提？这是当局为了大张旗鼓纪念毛诞辰 120 周年所做的统一部署。习近平上台后，为了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重新拾起毛这把刀子，提出“两个 30 年不能互相否定”，举毛旗，走老路，大抓“舆论斗争”，四处亮剑，国内政治生态大幅左转。作为

官方毛传的执笔人之一，李捷在这波捧毛造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前些天，他发表重头文章《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绩不容抹杀》，宣称“‘非毛化’虚无掉的正是中华民族脊梁”。现在又拿《晚年周恩来》开刀，原因很简单——这本书在大陆广为流传，号称“部级干部人手一册”，当局视为非毛化的代表作，挖了共产党的祖坟，“影响极其恶劣”。如果不肃清这本书的影响，就难以恢复毛已经残破的神话偶像。这就是李捷以“权威”的身份出来批《晚年周恩来》的政治背景。

首先要指出的是，李捷这篇文章与学术讨论毫无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攻击。我曾与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同事过。通篇读过李文，实在是为这位前同事感到汗颜，完全是在炒冷饭，根本不值一驳。该文多处抄袭当年司马公文章的内容，有些地方甚至一字不动地大段照搬，比如：“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乃至李文最后一段中“读了这部书，总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种思想意向拉着读者走……”，除了把最后一句中“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哉”的“哉”改为“耶”外，其余两百五十余字全部照抄司马公文。仅此一端，便可知李文的质量如何。这样明显的大段抄袭，或可免被追究剽窃之责，却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之实。

更让他砸自己牌子的是，李捷文中把毛除夕夜放鞭炮那件事说成是在1975年，而张玉凤的文章里明明写的是“1976年的春节”，李文照抄都把时间抄错了。还有李文中“伍豪事件”那段也是完全照抄司马公文，硬说我在《晚年周恩来》中没有提及毛泽东1968年对此作出的“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批示。事实上，当年我在批驳司马公时，就已经指出这是在捏造事实，蒙骗读者，并指明在《晚年周恩来》第244页中不仅明确提及这一点，而且还注明了出处。结果这位李同事仍然照抄不误，将错就错。一个堂堂的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学问竟然做得如此马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破绽百出，怎么还好意思以“权威”身份教训人，真不知道他怎么向上面交待？又怎么对得起被他忽悠的社会大众？国内共识网今天刊出当年司马公长文，人们正好可以结合对照李文和我当年的反驳文章，查阅一下《晚年周恩来》第244页，孰是孰非便可一目了然。

鉴于李文通篇不过是在重复当年司马公文的陈词滥调，而我的主要观点已经在与司马公的辩论中阐述过，对其指责也一一作过回应，这里就不赘述了，只对几个主要问题再申述一下。对这场争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前往下面的链接观战，自行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

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7-11/59266375-all.html>（见本刊zk0503c——编注）

高文谦：《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复司马公》 <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817>（见本刊zk0503c,d——编注）

关于伍豪事件问题，这是考察毛、周关系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周至死一直念念不忘。我在《晚年周恩来》中说，这件事是周晚年的一大心病，是他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李文说我“没有注明依据，是作者的主观推断”。事实上，这一说法出自邓颖超之口。1989年4月她在约谈《周恩来传》时，曾专门提到“伍豪启事”问题，说这是周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另一件事则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谈话是有文字记录的。李捷作为官方毛传的执笔人，应该看过这份记录。他之所以还要这样说，就是想给我扣上“主观推断”的帽子，然后做文章。

必须指出，让江青这条“主席的狗”为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背黑锅是官方的一贯手法。

李文在伍豪事件问题上也是这样做的，把全部责任推给江青，而对毛则采取掐头去尾的“障眼法”进行遮掩，只提毛1968年的批示，制造这件事已经了结的假象。但事实正好相反，周并没有因此而从伍豪事件中解脱出来，有生之年一直被这件事纠缠。李文中还说毛1967年5月对伍豪启事批示“存”的意思是对此“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在1972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又再度把伍豪启事这件事翻出来，让周专门为此向大会做报告，并要各省档案馆保存一份呢？李文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不仅如此，毛还在1975年发动评水浒运动，批投降派。这显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所影射，首当其冲的就是既背着伍豪启事历史包袱，又被批为对美外交投降的周恩来。正因为如此，1975年9月20日，周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在已经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的情况下，还强撑着把“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在进入手术室前，周又大声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后，邓颖超让汪东兴向毛报告这件事。凡此种种，不正说明了周一直到临死前还在为伍豪启事担心吗？证实了《晚年周恩来》所述不虚。

林彪问题也成了李文指责我的一个题目，说“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这里要再次指出，李文这些说法又是在大段照抄司马公文。

不错，林彪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政治上对毛阳奉阴违，有许多两面派行为，可是在中共体制内又有谁能说真话呢？若论玩弄阴谋，林彪与毛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否则就不会被逼得死于非命了。李文中历数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种种表现，却把这出戏的主角毛轻轻放过。这种明显带有选择性的叙述，恰恰暴露了官方史学才是在为“预设的创作意图服务”。李文指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可当年不正是毛把林彪叫上庐山，并坚持让林接替彭担任国防部长的吗？又如，李文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唱反调，吹捧毛一贯正确英明；可是在林彪讲话后，不正是毛带头鼓掌、大加赞扬的吗？文革发动前夕，不正是毛要罗瑞卿传话给林彪，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的吗？

如同评周一样，评价林彪也涉及到批毛的问题。只有还毛的历史本来面目，才能廓清事实真相，把林彪问题说清楚。比如，在文革酝酿和发动的问题上，林彪负有重要责任，但始作俑者是毛，而不是林，林彪的罪过再大，也大不过毛。至于说毛翻云覆雨，惯于玩弄阴谋，一点也没有冤枉他。甚至毛本人对此也不讳言，辩称自己搞的是“阳谋”。别的不说，毛在庐山会议上就是出尔反尔，欲擒故纵，先是同意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事后又不认账，这不是搞阴谋又是什么？更不用说为了倒林，毛违背中共组织原则，背着林彪这个已经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跑到各地“煽风点火”，一面说“三要三不要”，一面又大讲“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抓黑手”，这种做法究竟是“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呢？

在周恩来治病问题上，李文指我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大概是看到我当年一一驳倒司马公文中的各种辩解后，不再纠缠其中细节，以免自寻尴尬，转而拿我在八十年代说过的话做文章，似乎这样一来就抓住了把柄，指我“判若两人、前后矛盾”。真实情况是，我在八十年代编写官方《周恩来年谱》文革部分时，就对当时周治病被一再延误感到蹊跷，特别是得知毛对周治病下达的“四条指示”后更是感到震惊。（其内容是：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我在采访一些曾在周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时，他们对此也很不理解，认为其中有鬼。不过由于当时人在体制内，无法畅所欲言，所以我在写《在最后的日子里》一文时回避了这方面的内容。

六四后，人到了海外，不再受拘束，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李捷应该对当一个御用学者在夹缝中做文章的苦衷比我更清楚。在这种体制里面呆长了，会丧失自我，人格扭曲乃至严重分裂——当面做鬼，背后是人。这也是我决心离开这种体制的原因之一。

我在《晚年周恩来》和驳司马公一文中，根据所掌握的档案材料，详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阻挠延误周恩来治病的祸首。周发现患癌症后，根据毛的四条指示，整整拖了9个月，其间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直到大量尿血后才不得不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而毛又通过汪东兴下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许做电灼手术，要他们“服从大局”。最后还是医疗组的专家暗中抗命，在手术时悄悄把癌变部分烧掉了，但已错失早期发现治疗的宝贵时机，导致周体内癌细胞已经转移，一切都已无可挽回。我在批驳司马公的文章里，逐条批驳了该文中为毛四条指示所进行的各种辩解。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晚年周恩来》和我驳司马公的文章找来看一下，就会看出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

十年前《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我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毛时代时曾经表示：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为了一己之私——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唯恐身后被“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清算，不惜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入文革十年浩劫之中。毛时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中国当前正在大变的前夜，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毛泽东虽已死多年，但幽灵至今仍在四处游荡，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时局或有重演文革惨剧的趋势。海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此忧心忡忡。因此如何评价毛事关国家未来走向。既然李捷这位毛家湾的老同事找上门来，我只有应战，来而不往非礼也。鉴于他现在正卖力扮演官方挾伐“非毛化”的重要角色，我这个货真价实的“非毛化”分子愿借此机会向李捷下战书，公开辩论毛的功罪是非，各抒己见，题目由他来定。希望当局开放网禁，允许大陆民众观战。不知李捷有没有勇气应战？

□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3-10-21

~~~~~

## 【史实辨析】

### 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

• 尹曙生 •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过很多重大政治事件，影响深远。“彻底砸烂公、检、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影响也很深远。本文就这一事件和毛泽东有什么关系，进行探讨。

◇ 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

从1949年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毛泽东对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是十分重视的，始终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别人不得干涉。由于文革前17年，公安机关在公、检、法三机关中一直处于老大的地位，检察院、法院实际成了陪衬，在“大跃进”年代，检察院、法院甚至一度被取消，只保留名称，其领导人带上公章到公安机关联合办公，以政法部的名义代替了公、检、法；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被军事管制，而检察院、法院被撤销了。所以我说毛泽东十分重视公、检、法，主要说的是十分重视公安机关，文革中提出的“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彻底砸烂公安机

关”。

让我们来考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砸烂公安机关的历史事实：

1966年11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来京的造反派时说：“公安机关十七年来干尽了坏事，要打倒、要砸烂。”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她敢这么说吗？

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毛泽东受到围困，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脱离险境，安全到达上海。7月23日，谢富治、王力随周恩来飞回北京，受到英雄般的接待。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和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合影，电视台当晚播出。接着，谢富治在公安部大礼堂向迎接他的公安部干部讲述处理武汉事件经过。会议结束后，他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副部长级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说：“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震、施义之当晚通过公安部造反派报纸《红旗》将这一消息刊登，并迅速传遍全国，立即在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谢富治是一个有谋略、有头脑、非常谨慎、圆滑的政治人物，他知道领袖的厉害，如果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他是没有胆量敢假传“圣旨”的。

1968年3月18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浙江赴京汇报的代表时，江青诬陷说：“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副主席向毛主席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指的是1965年秋，叶群受林彪指派到杭州告罗瑞卿的状，导致罗瑞卿被打倒）”；“叶群走一步路，都有人盯梢，进行监视”；“公安机关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比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敢这样公开讲吗？！

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是：1968年7月28日，他在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当有人汇报谈到北京市公安局揪出很多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900多人时，毛泽东说：“提出砸烂公、检、法，我说好！”据韩爱晶记录，毛泽东还说：“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公开）提出来的，北京市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几人，其余进学习班”。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中央文革成员。

1966年、1967年，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从军队选调兵团级干部1人，军级干部3人，师级干部10人，团级干部20人，以后还调进大批军队干部，进驻公安部，实际掌控了公安部的权力，公安部绝大多数干部被遣送黑龙江农场审查、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共中央（67）379号文件，要求“凡全国公安机关未军管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文件下发后，大批军人浩浩荡荡开进公安机关，95%以上的公安干警被集中下放农村改造。一直被称为党的刀把子的公安机关，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警察机构一样，被解放军接管。如果毛泽东还信任公安机关，能这样干吗？

为了寻找砸烂公安机关的理由，扩大宣传影响，对公安机关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1968年8月9日，谢富治授权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

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这么一个荒唐可笑的报告送到中央，毛泽东看了，亲自批示：“请各地军管部门注意此类情况。”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对这样一个充满谎言的报告，以毛泽东的睿智，他真的相信吗？可是他确实作了批示，而且要全国公安机关军管会，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那样来调查类似问题，这就说明他老人家这时对公安机关确实不再信任了。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是坚决要（支持）砸烂公安机关的。

在砸烂公安机关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有3.4万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被打死1200多人，伤残3600多人，被捕判刑1300多人。公安部5位副部长被捕，政治部主任隔离审查；罗瑞卿、谢富治的老搭档、二把手副部长徐子荣被捕后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军人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后，涉嫌被监禁。公安部正副司、局长49人中，有43人先后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名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有225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打成特务、叛徒、三反分子，47人被捕入狱。上海市公安局被砸烂后，有2980名干警受到残酷迫害，有78人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残。浙江省公安厅666名干警，被审查、批斗298人，隔离审查88人，受处分74人。前任厅长王芳、现任副厅长吕剑光等6名干部被怀疑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押解北京囚禁审查。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所有的人都被审查、打倒过，有45人坐过牢，自杀、死在监狱里17人。

◇ 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砸烂公、检、法，特别是他亲自领导、关怀有加的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是毛泽东亲自培育、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中国大地上曾经一度出现过没有吸毒、没有赌博、没有卖淫嫖娼，刑事犯罪案件很少，甚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受到国内外一致赞扬。但是，随着“左”倾路线逐步抬头，毛泽东在国内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必然要遭到抵制和反抗，社会治安出现动荡。毛泽东运用公安机关对这些抵制和反抗不断进行镇压（见《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保证了这些运动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因此，公安机关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但是对毛泽东而言，公安机关是绝对忠实于他的，他没有理由不信任。

文革前的全国公安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与各省、市公安厅局长合影留念，以致不少其他部门领导人羡慕当公安机关领导。文革前，无论是罗瑞卿，还是谢富治当公安部长期间，毛泽东对公安工作有过批评，曾经批评过“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但那是关心、爱护，从来没有说过、表示过要“砸烂”。文革一到，为什么突然要砸烂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是要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打倒刘少奇，首先拿他的得力干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刀。而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直接分管领导政法工作；罗瑞卿更是直接管了十年公、检、法，当了十年公安部长，影响很大。彭真、罗瑞卿被打倒了，他们直接领导的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就好比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难逃厄运。就像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被打倒了，中宣部也就成了“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一个道理。彭真被打倒了，他主管的北京市委也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被彻底改组。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底，就被打倒，并不是他犯了什么大错误，仅仅是因为和林彪有矛盾，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林彪领导的军队全力支持，不得不牺牲他，而他

当公安部长达10年之久，如果不否定公安机关，也是说不过去的。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各地的造反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打的旗号都是要打倒本地区、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要从他们手中夺权。但是，公安机关广大干警长期受到的教育是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对党不能有任何怀疑，各级党委就是代表党的，所以公安机关组织起来的造反派基本上是保守的，被称为保皇派，“奉命造反”，就是名曰造反，实际暗中保护“走资派”过关，等时局变了，在党委领导下抓右派，像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一样。公安机关是专政工具，公安干警有组织性、有战斗力，还有武器，社会上不少造反派慑于它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各级公安机关成了造反派造反的最大障碍，不消除这个障碍，文化大革命就进行不下去，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后，公安机关首当其冲成了社会上造反派一致攻击的目标。但是，没有中央、没有毛泽东的允许，谁也不敢贸然夺它的权。文革初期，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要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但是谈何容易，他们请示谢富治；可谢富治也不敢擅自做主，只好请示周恩来同意，允许先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公安分局的权，作为试点，但是不久就被勒令造反派退出，由军队接管。1967年到1968年，正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全面夺权的高潮，公安机关却成了最大障碍，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在公安机关秘密安排下转移，躲避造反派的批斗。青海省省长王昭，被造反派非法关押，公安厅干部将他秘密接走，送到洛阳治病，连中央想找他也找不到，后来还是公安部造反派奉中央领导命令，把他找到，交给中央。毛泽东为了文化大革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进行，就必须毫不犹豫地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以便清除阻碍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但是他也担心会造成乱子，所以“砸烂”后，实行军管，没有让造反派掌管。要砸烂、要军管，就必须制造砸烂的理由，中央1968（142）号文件就应运而生。其实毛泽东心里清楚，如果公安机关真的像文件上所说的彭真、罗瑞卿、刘仁（北京市委常务副书记、二把手）是大叛徒、大特务，勾结美、蒋，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他能安全活到文化大革命吗？所以在1970年11月召开的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时，与会代表对彻底砸烂公安机关有意见，要求公安部领导解释，于是部长李震（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司令是陈锡联）以公安部领导小组的名义，直接写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这个批示没有说彻底砸烂公、检、法是错的，仅仅是说口号不科学。不科学就在于“砸烂”这个词难以理解。改为“公、检、法彻底闹革命”，就能理解了。就是说，公、检、法是有严重问题的，要革命，而且要“彻底”革命。“彻底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仍然是不信任公安机关。这从毛泽东亲自批准下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上可以看出。“纪要”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工作进行了严厉批判，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在公安战线上“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彻底清除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公安路线”，“要彻底改造公安机关”。

把“彻底砸烂”变成“彻底改造”，意思是一样的，这样就合乎“科学”了。

三是毛泽东过去信任公安机关，文革爆发后不信任，并不奇怪。这时的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疑神疑鬼，认为有人要发动政变，搞资产阶级复辟。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亲笔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从历史的角度，大谈特谈政变经，杯弓蛇影，似乎中国有人正在企图搞政变、搞复辟，以呼应毛泽东的话。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为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要搞政变，一是发动军事政变，达到政权更迭的目的，而这时军队掌握在毛泽东最信赖的接班人林彪手里，他大可放心；二是利用秘密警察，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领导人抓起来，实现政权更迭的目的。这样做，只有长期掌握警察大权的人有这个条件。彭真、罗瑞卿在公、检、法系统影响深远，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被打倒，其追随者会不会这样干呢？毛泽东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有不安全感，并不奇怪。十月革命后，苏联秘密警察头子，除创建者捷尔仁斯基过早病死外，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清楚。文革初期，江青那样咬牙切齿痛恨公安机关，不能仅仅归结为她的个人恩怨，难道没有领袖的担忧？！

四是解放后公安机关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敌伪档案，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就成了一些人的心病，生怕有人从这些档案中发现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红卫兵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专案审查，都离不开敌伪档案。所以公安机关受到“格外重视”，都想把公安机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利用敌伪档案，抹黑对手，洗刷自己历史污点。这就必须通过夺权手段来实现。要夺权，就要先造舆论，抹黑公安机关，然后“砸烂”，乱中取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发现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丑事，并编成小册子散发。江青看到后哭哭啼啼地对周总理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这时上海市公安局已军管，她说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实指上海市公安局原来的干警）”。然后由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人，集体授权吴法宪到上海去收缴有关江青的传单、材料。吴法宪在张春桥的具体操办下，收缴了大量传单、小册子，并逮捕了搜集、编印的人，连同原公安局处长黄赤波等人，一起乘专机飞回北京。材料封好，全部交给江青自己处理，人被非法关押起来。公安机关被军事接管后，组织大量军人清理敌伪档案，寻找所谓叛徒、特务，为中央专案服务。对刘少奇的定性是“叛徒、内奸、工贼”，材料就是从这些档案中找来，断章取义形成的。公安机关敌伪档案帮了毛泽东大忙，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混进各级领导层呢！这样才能证明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五是窃听器风波又起，公安机关成了重点怀疑对象，不砸烂不罢休。用窃听器搞窃听，是侦查工作的一项手段，国内外间谍、情报机关都利用这一重要手段。我们国家对利用这一手段有着严格规定：只准用于对敌斗争，严禁用于党内，而且有着严格的批准手续。江青污蔑公安机关对她和毛泽东使用窃听手段，是天方夜谭，荒唐可笑。

被渲染成窃听风波的录音风波，是从中央办公厅刮出来的，跟公安机关无关。1958年11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出于对领袖毛泽东的崇敬，感到有必要运用现代化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多次向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他的想法。最终毛泽东也认可这一做法，并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对这个规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主要领导看了，都签字表示同意。但是，毛泽东有些讲话不愿意录音。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胡乔木插话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主席外出录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1年1月至4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武汉停留期间发现在他的专列上安装的录音设备，没有拆除，录下了他和服务员的谈话。毛泽东大为愤怒，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严肃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给予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



任康一民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几个秘书也被牵连进去，受到处分。1961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的五项规定。到此，录音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五、六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敢搞录音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早已解决了的录音问题，被重新提起，把这样一项正常的、曾经被毛泽东批准的秘书工作的一个环节、一项业务工作，变成了公安和情报机关搞窃听，搞侦查，从而为打倒某些人寻找口实。杨尚昆首当其冲，他被打倒，一条重要“罪行”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尽管给中央领导录音是中央办公厅所为，跟公安机关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把录音提升到搞窃听，性质完全变了，那就只有公安和情报机关才有资格、才有本事做这件事。文革前，国内反间谍侦查工作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对特务、间谍搞窃听，属于侦查工作的一项手段，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说公安机关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这项手段，那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是毛泽东住过、去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比如杭州，毛泽东到那里去过40多次，住的时间很长，仅次于北京，仅1966年毛泽东就8次去杭州。因此这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是重点怀疑对象。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九六六年二、三月间，根据中央最高领导旨意，中央有关部门派出若干检查组到这些地方毛泽东经常住的宾馆、别墅，检查有无安装窃听器情况。副部长徐子荣被派往上海、杭州检查。其时他已经被怀疑是窃听中央领导的主事人之一，派他去检查是在考验他。他在上海、杭州检查，没有发现在毛泽东常住的宾馆、别墅（如西湖边上的汪庄、刘庄别墅）安装过窃听器，参与检查的还有中央办公厅的人员。他从上海、杭州回北京后，谢富治不听他汇报，把他排除在公安部领导之外，不给他分配工作，不和他见面，文革一开始，就将他打倒。

尽管在“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几年时间里，没有发现一个地方公安机关搞过这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但是被怀疑而抓进去的几十名公安机关领导迟迟不放、不审、不判，从精神上、肉体上进行折磨，有的人就死在监狱里，如徐子荣。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因窃听罪1968年2月被秘密逮捕关押北京监狱，直到1975年释放，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精神、肉体都遭到极大摧残，十根肋骨折断，一身是病，1978年过早死亡，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烈士。他在公安局长任内，每次毛泽东、江青到上海，鞍前马后，为领袖夫妇的安全操碎了心，到头来被污蔑对毛泽东、江青搞窃听，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可悲的是，黄赤波在主政上海市公安局期间，同样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了很多，但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觉悟，没有丝毫悔意。1978年8月22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追忆罗部长对上海公安工作的关怀”一文中说：1953年4月，罗瑞卿部长到南京，把他找去，要调他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谆谆叮嘱我把扬帆包庇下来的、甚至混入公安机关内部的一批反革命特务分子进行严肃处理，消除了一大隐患”。是啊！当年他不负罗瑞卿的重托，在上海市公安局掀起了一场风暴，给闻名于世的“潘汉年、扬帆事件”大冤案火上浇油，大批干部受株连，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有的死在监狱里。他曾经在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大会上说：“扬帆是一只坏母鸡，生了一窝子坏蛋”，“打开来蛋黄都是黑的”；“我就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这就是阶级斗争”，“扬帆是一只大辣椒，还有小辣椒，辣椒面呢！”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株连无辜就成为必然，上海市公安局有600多名干警蒙冤入狱，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主政上海市公安局十年之久，没有主动纠正和向上级反映纠正这一大冤案。一直到1978年，“四人帮”已经被粉碎近两年，他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真是悲哀！同样，他的顶头上司公安部长罗瑞卿，1955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带领人员到北京饭店逮捕潘汉年后，并与副部长徐子荣一起亲自审讯，积极指导专案人员几十次审讯潘汉年、扬帆，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尽管长时间找不到证据，不能定罪，他们没有主动纠正，也没有向中央反映，请求纠正，就这样把那些蒙冤的人长期关在监狱里耗着，把人耗死、耗疯、耗残废、耗得家破人亡为止。罗瑞卿、徐子荣、黄赤波等人奉命以莫须有罪名整人，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却

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整，被抓进监狱里耗着。徐子荣被耗死，罗瑞卿、黄赤波被耗成残废，过早去世。到头来，他们都只不过是在政治斗争中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是现代版的“请君入瓮”，令人唏嘘不已。

历史一再证明，封建专制独裁体制不消除，“请君入瓮”的故事，还将会重演。“干公安的就好像在刀尖上跳舞”，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曾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

□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

【史海钩沉】

华国锋奉周恩来之命调查李震事件

• 李海文 •

◇ 周恩来说：由华国锋负责李震案破案工作，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

1973年10月22日下午1时许，华国锋突然接到通知，马上到国务院会议厅开会。而周恩来召开会议一般在下午3时左右，出了什么事？华国锋快步赶到会议厅。

周恩来到沈阳和秘密来访的金日成会谈结束后，刚飞回北京，即召开会议，可见事情的紧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等人。

周恩来宣布开会，介绍了公安部部长李震突然死亡，中午在机关大院一个地下管道内尸体被发现的情况。

此时，周恩来处境艰难。7月，因外交部158号简报之事，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8月5日，毛泽东专门找江青谈话，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江青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受到周恩来的反对。周说这个问题“还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儒法斗争的内容虽然没有写进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但是“四人帮”控制了舆论，在他们积极组织 and 活动下，9月4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迟群在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受到周恩来的批评。迟群自恃有“四人帮”的支持，10月15日说：“反对反孔，就是复辟。”“四人帮”在报上不断发表评法批儒的文章，借题发挥，影射周恩来是大儒，暗批周恩来，调门越来越高。周恩来主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工作刚刚开始，围绕人事安排和“四人帮”的斗争日趋激烈。国务院的部长突然死亡，雪上加霜，斗争形势更加诡异，“四人帮”则窃窃自喜，周恩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只有迅速查明真相，平息各方争论，才能稳住局势。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讲到李震之死的原因时，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做了个手势，用手抹脖子。周恩来问：自杀？于桑说：我没有说自杀，是上吊。周恩来决定由于桑、吴忠、杨俊生、杨德中、刘传新成立破案组，从外地调来技术人员调查死因。

23日下午3时，周恩来将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叫到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听取大家的看法。

周恩来说：由华国锋负责李震案破案工作，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这是中共十大后周恩来直接交给华国锋的一项任务，表明他对华国锋的信任和倚重。在此之前，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过问公安部工作，华国锋从未参与其中。周恩来认为华国锋与公安部没有任何关系，没有框框束缚，比较超脱，而且做事稳妥、不跟风、有主见、可靠。同时，毛泽东信任华国锋。只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四人帮”的阴谋才能不攻自破。

周恩来指定破案组增加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张其瑞（造反派）、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周恩来说，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工作，主要是在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吴德就赶到人民大会堂，出席晚上9时30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四人帮”在会上大叫李震之死是阶级敌人谋杀，要追查凶手。会后，周恩来写信将李震之死和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24日下午6时，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开会。晚9时，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研究关于李震之死的问题。

◇ 李震非正常死亡不仅惊动了周恩来、毛泽东，在公安部也引起巨大的震动

公安部历来是国家的重要部门，在国家机构中的排序虽是法院、检察院、公安部，但实际上一直是以公检法为序排列，这是历史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前，在根据地，一个县里，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三个人最重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亲自过问公安部的工作。法院、检察院负责人都是公安部党组成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点将，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1959年9月18日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部长。1965年谢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仍兼任公安部部长一职。罗瑞卿虽然离开公安部，但他在1962年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分管政法工作。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罗遭到林彪的诬陷，受到错误的批判，被停止工作，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其职务。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被说成是罗的死党，1966年2月被打倒。同年5月，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凌云被打倒。这样牵连了公安部的很多人，许多干部被停职。

林彪、江青为了夺权，就要彻底否定人民的专政机关——公检法。1967年8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并切断公安部与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的关系。公安机关受到极大的冲击，陷于瘫痪。公安部更是重灾区，许多人被批判、被打倒、被关押，工作陷于停顿。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军队抽调32名军、师、团级干部到公安部掌握部、局两级的领导权，实际上是彻底改组公安部领导班子，实行不叫军管的军管。公安部成立了以谢富治为首的领导小组，主持部机关的“斗、批、改”运动，任命沈阳军区副政委李震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二十一军政委施义之为政治部主任。1970年春谢富治因癌症住院，中央在6月任命李震为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震在中共九大、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文革”中，公安部的许多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和一批正副局长被关进监狱。同时，对全国公安机

关实行军管。1969年初，以机构改革为名，公安部由1200人减至100人左右，除留下40个造反派成员外，其余干部包括副部长于桑、刘复之连同家属在内，春节后一律被送到黑龙江笔架山农场和湖北沙洋农场（干校）劳动。

1970年，于桑、刘复之回到北京参加公安部核心小组工作。于桑，16岁参加红军，19岁入党，在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性格内向，在家里寡言少语，但在工作中却是一个敢于讲话、敢于负责的干部。刘复之，20岁参加革命，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掌管着公安部的中枢，有主见、有头脑，性格开朗，含而不露。

“九一三”事件后，公安部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在核心小组会议上，于桑说：“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他说：“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动员大家提意见时，刘复之和于桑的看法一致。群众提的意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砸烂公检法”；下放到“五七”干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文革”以来社会治安发案率高，破案率低。

◇ 于桑组织技术人员，经过三天的调查，作出结论：李震是自杀

随着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落实政策，解放了不少干部。1972年秋，被打倒的干部大都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从干校回到北京，有的分配工作，有的等待分配工作。这些人受审查多年，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他们反对“文革”中的逼、供、信做法，认为这违反党的原则，违反党的优良传统，违反公安工作一贯的政策。他们不掌握全局，只是针对具体工作、具体错误提出意见，并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回忆说：当时我们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谁也不敢轻易怀疑毛主席、党中央，更谈不上否定。

军队干部、造反派不仅不认错，反而指责于桑、刘复之带头“算旧账”。“算旧账”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就造成了公安部的造反派、军队干部和公安部老干部之间的矛盾。1972年底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撤销“三支两军”后，大部分部队干部都回到了部队，但公安部从没有宣布过军管，军队干部基本没有走。1972年冬召开的第十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总结了1970年以来的工作情况，研究了1973年的工作部署，在会上有人又一次反“算旧账”，批评于桑、刘复之。但是“文革”这一套明明做错了，批评不能使人服气。会议结束后要给中央写报告，起草的报告中写道：“‘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虽然李先念、纪登奎参加了会议，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参加了最后的总结大会，但由于于桑坚决反对，核心小组对此争持不下，向中央的报告迟迟未能定稿。

1973年10月，李震将出差的于桑、刘复之叫回来，20日开会。李震和曾威坐在一起，于桑、刘复之坐在一起。李震说：“算旧账”的事要收收口。于桑和曾威双方拍了桌子，不欢而散。星期一继续开会，就是不见李震，一开始以为他到周总理那里去了，到处打电话找。中午，两名工人在公安部机关大院东南角的地下热力管道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正好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回家（住在公安部大院内）碰上，马上叫人通知核心小组。施义之、于桑、曾威、刘复之等都赶了过来，刘湘屏要于桑和曾威下去看现场。李震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子上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估计是21日深夜死的，口袋里装有安眠药。

22日，于桑组织技术人员，经过三天的调查，作出结论：李震是自杀。他实事求是，如实报告。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份报告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给他招来了牢狱之灾。

◇ 华国锋说：刘湘屏起了很坏的作用

刘湘屏原是第八机械工业部一名局级干部，“文革”初期，她曾动员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的

夫人林轩一起写“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大字报，遭到林的拒绝。林轩说：“我的觉悟还没有认识到。”1970年6月，刘湘屏被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革委会副主任（八机部和一机部合并），1973年7月至1976年10月任卫生部部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在中共十大上，她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刘湘屏和李震同在太行地区工作，李震死前几天还到过她家，他们相当熟悉。周恩来召开会议，研究公安部的问题，她极力说于桑处理得不对，说于桑是老公安，却明知故犯，破坏了现场。刘复之也看过现场。她认为李震是“他人谋杀”，于桑、刘复之就是后台。

周恩来对李震印象不错，李震之死给他的压力很大，他还征求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意见。李震死后，沈阳军区的干部说：中央要人，我们将最好的干部送去，怎么到了中央落了这样的下场？周恩来说：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的因素。拘泥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认为他死于十大之后，四届全国人大之前，考虑问题要深些。

2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政治局会议，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加，于桑、刘复之一进入人民大会堂就被抓了起来。周恩来宣布撤销于桑破案组组长的职务，将于桑、刘复之及参与调查的人隔离审查。同时，周恩来决定进行保护性审查，没有关在秦城监狱，而是关在交通干校，任何人不准提审于桑、刘复之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后来只是派人问过于桑：“你说李震是自杀，有什么根据？”

周恩来在会上宣布施义之为核心小组负责人。施义之出身贫苦农民，当过学徒，21岁参加新四军，同年参加共产党，转战南北，由基层一步一步提升，1964年为军政委，1966年12月到公安部工作。

施义之汇报说：“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你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吵架阶段，于、刘不是后台，跳到前台来了。”

周恩来决定破案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负责，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公安部核心小组负责人施义之、张其瑞（造反派、核心小组成员），刘湘屏、刘传新及卫戍区副政委邹平光参加，限期破案。涉及公安部内部的由公安部查，涉及部外的由北京市公安局查。同时决定公安部进行关门动员整顿。

27日，周恩来又一次书面报告毛泽东，汇报李案详情及政治局会议情况。27日晚7时，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研究李震事件。

造反派、军队干部咬住是“他杀”不放，大有“不破此案，死不瞑目”的架势。在公安部，他们逐人排查，凡是这几天见过、找过李震或李震秘书的，都要说清楚李震死的前五天到哪里去了，做了什么，与哪些人接触过，并要找到证人。发现有可疑现象要追查后台，就是不住在部里的老干部也成了怀疑对象，他们虽没有作案的可能，但有后台之嫌。对可疑之人要当堂对质。追查的范围越来越广，涉及116名机关干部职工，人人自危，机关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

案件查来查去却查不出“他杀”的证据，找不到凶手。吴忠和李震以前都是二野的干部，抗美援朝时还在一个军工作过，吴任师长，李任军政委。吴倾向李是“他杀”。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都去过公安部，也没有什么结果。

◇ 华国锋说：刘湘屏、公安部造反派、一些军队干部可厉害了。但是，再厉害，我也要实事求是，只能以事实为根据

华国锋亲自到现场察看，掌握第一手的材料。从公安部到政治局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现场并没有像刘湘屏所说的那样遭到破坏，进去就是台阶，只有李震一个人的脚印，他走到里面，又走回来，到管子那儿吃了安眠药，然后上吊自杀。办案人员的脚印都可以核对出来，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地方很狭小，没有其他人的脚印，就是自杀。那天晚上，李震去办公室看《参考要文》，他从5号楼出来还碰上了办公厅主任席国光。有人以此说李震是在5号楼被打死后送到那个管道里的。这个地方很狭小，他杀是不可能的。

华国锋如实向周恩来报告，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指示从北京、广州、上海、天津等地公安局调来技术人员进行侦破。虽然未告诉专家们死者是谁，但大家一致判定是自杀。1973年11月8日夜，周恩来找到刘湘屏和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谈话，并请吴阶平解剖李震尸体。刘湘屏认为李震是“他杀”，让她参与其中既在情理之中，也便于她的思想转变。

李震死后，其家属被安排到了台基厂15号，和吴忠同住一栋楼。于桑、刘复之被关在交通干校，由北京卫戍区管理。因刘复之是华侨，有人说他是“特务”“里通外国”，这样牵涉的人就很多，他的家属和亲戚14人被隔离。其中有一对夫妇在天津，华国锋将天津市领导解学恭、王曼恬找来。华国锋亲自审问刘的亲戚，如实向周恩来报告，刘复之没有里通外国。

华国锋认为在案子审查清楚之前，不能牵连孩子。他告诉总政治部负责人，部队不要让孩子们退伍、转业。但此事震动京城，于桑的孩子多在北京附近当兵，通知还没有发下去，部队已作了退伍处理。刘复之的女儿刘红燕远在福建，部队接到通知，既没有让她退伍，也不让回京探亲，用这种措施保护了她。

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刘湘屏、公安部造反派、一些军队干部可厉害了。但是，再厉害，我也要实事求是，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为了说服他们，光化验血就不知化验了多少次，都证明李吃进的安眠药和地上掉的安眠药是完全一样的。

华国锋多次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会议，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请其他部、委负责人参加。华国锋为了听清每个人的发言，谁发言他就站在谁的后面听。他们始终就是那几条意见，拿不出“他杀”的证据。

但是，找不出李震自杀的原因，就难以说服对方。是不是有凶手，只有在一一排查后，才能下结论。另外，造反派、军队干部劲头那么大，运动起来了也不是随便能停的，因此公安部内部的清查仍在进行。

没有停止公安部内部的清查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王洪文一口咬定是“他杀”。1973年10月29日，他到中央读书班，煞有介事地说：“公安部部长李震死了，百分之九十九是被阶级敌人谋杀的。公安部长被杀，古今中外罕见。”王洪文想插手此事，他专门去公安部，发现李震上吊的绳子上打了一个结，老讲打结如何如何。李震上吊的绳子是从办公室窗帘绳上剪下来的，他就抓住大做文章。华国锋后来谈到王洪文当年的表现用了四个字：“实在幼稚。”

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职务的提高并不等于能力的提高。毛泽东创造条件让他慢慢熟悉中央的情况，和李德生一起负责读书班，所以他有的是时间。李震一案，他什么事都要过问。“四人帮”深知公安部掌管着专政大权，是国家的重要部门，早就想插手，既可名正言顺地安插人，又可打击周恩来。王洪文出于政治考虑，一味地支持造反派。他既不懂技术侦查，又不明事理，不断制造事端，为搞清问题增加了许多困难。

王洪文见案子拖下来，迟迟没有按照他的预想找到凶手，不甘心。他借机在11月3日、4日将祝家耀从中央读书班调到公安部，准备让他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祝家耀，原是上海5703工厂的工人，和王一起造反后，任上海机管局负责人，对王洪文照顾有加。中共十大时连代表都不是，在王的坚持下他当选中央委员。十大后，毛泽东接受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教训，提出工农中央委员要学习马列著作，在北京分批分期办中央读书班，由王洪文、李德生负责。10月初第二期开学，王洪文指定祝家耀为地方支部的委员。

11月10日到13日，周恩来和基辛格会谈。14日、15日，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公安部的事项，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16日凌晨1时才结束。李震死亡的原因有争议，结论定不下来，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一直是压在周恩来心头的一块石头。

王洪文说：派工人增强力量，要祝家耀到公安部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派上海警备区政委徐海涛（后调到总政保卫部任副部长）到公安部帮助工作。

周恩来不能让“四人帮”控制公安部，针锋相对说：调去的同志都不熟悉地方工作，我看还是让杨贵去吧。

周恩来讲了话，王洪文不得不同意，16日晚找杨贵谈话。

◇ 华国锋找杨贵谈话：要很快将问题搞清楚。你明天就去公安部报到

杨贵，1942年参加革命，1943年入党，1954年任河南林县县委书记，1965年任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1960年在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领导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顶着压力，排除干扰，经过10年努力终于全线建成通水。杨贵以修红旗渠出了名。“文革”一开始，林县人民保护他，但是外地的群众来抓他。在新华社记者的帮助下，他躲在北京，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才获得解放。1968年杨贵进入林县革委会，后任洛阳地委副书记、河南省常委，在十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周恩来提起杨贵的名字是有原因的。中央读书班第二期开学的第二天，1973年10月6日晚10时，周恩来在福建厅接见全体学员，看着花名册，一一点名，询问每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工作简历。71个人分两个支部，地方支部和军队支部。地方支部大都是年轻的劳模和造反派，只有杨贵年龄最大，入党30年，担任县委书记19年，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在读书班有这样资历的人凤毛麟角。会后，周恩来向纪登奎了解杨贵的情况。当王洪文提出祝家耀，周恩来马上提出了杨贵。

17日下午，华国锋找杨贵谈话：“对于李震之死，公安部说法不一，有些人说是他杀，也有说是自杀。现在还没有发现李震有什么问题。他为什么会自杀呢？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这两位副部长以及李震的秘书等十几位同志被保护性地隔离审查，要很快将问题搞清楚。你明天就去公安部报到。”

杨贵是候补中央委员，到公安部后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却排在中央委员祝家耀的前面，这是周恩来、华国锋的有意安排。此举引起王洪文、祝家耀的不满，但是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他们无可奈何。

杨贵、祝家耀参加了破案组工作。破案组由吴忠、罗青长、郭玉峰、施义之、祝家耀、张

其瑞、刘湘屏、刘传新、邹平光、杨贵等10人组成，仍由吴忠负责，经常在北京卫戍区召开会议。

王洪文通过祝家耀、徐海涛之口说出自己的看法。他们说：“能定他杀就定他杀。定不了他杀，就拖它三五年。否则，公安部右的势力又该活跃了。”他们是从派性斗争出发，根本不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祝家耀来后，能直通王洪文，明目张胆支持“他杀”的观点，使问题更加复杂，确定自杀更加困难。

◇ 华国锋不理睬王洪文，坚持调查研究。杨贵在华国锋领导下，顶着压力，把“他杀”的根据一个一个地否定

华国锋向周恩来报告了在现场调查的情况后，破案组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有于桑、刘复之的前车之鉴，大家谁也不敢明说李是自杀。

毛泽东一直很重视公安部的事情，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毛泽东列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拿出《明史通俗演义》送给周恩来，请他转交华国锋，要他们读第80回到第82回。这三回讲的是明朝末年发生在宫廷内的三个案子，这三个案子一直没有查清，成为宫廷斗争的话柄。

1973年12月初，华国锋召开破案小组会议，让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华国锋说：“没有调查研究说李震是自杀是错误的，不调查研究说是他杀也是不对的，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之后。”华国锋建议他们看毛主席所说的明代三大疑案。

华国锋明确了有“自杀”“他杀”两种可能。吴忠在卫戍区召开破案组会议，鼓励大家发言。这样慢慢大家才敢谈论自杀的根据，杨贵的工作也顺利多了。

为了说服对方，华国锋指示杨贵将“他杀”的根据一个一个地排查。他一一做试验，最后把“他杀”的根据一个个地都否定了，查明就是自杀。于桑、刘复之的结论是对的。

11月底至12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他无暇顾及公安部的事情。

12月24日下午3时，周恩来召集华国锋、吴德、纪登奎等部分政治局委员一起和吴忠、施义之等谈话，让他们回去在破案组吹吹风。

1974年1月初，吴忠领导的破案组在事实面前，确认李震是自杀。既然是自杀，与于桑、刘复之无关，那就应放人。祝家耀、徐海涛反对，他俩一唱一和：“就说李震不是他们杀的，但他们也有‘算旧账’的错误，不能放他们出来！”

华国锋坚持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核心小组只好决定分两步向下传达，先讲存在他杀与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

华国锋知道能让他们转弯已很不容易，同意核心小组的意见先召开大组（即相当于“文革”前的局级）和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核心小组的成员最终同意自杀一说，但是祝家耀及一些部队干部心里并不服气。部里的清查必须结束，而且越早越好。这个担子最后落在杨贵的身上。杨贵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破案组的结论，并代表核心小组承担了前段审查的责任。杨贵讲话后，解放了绝大部分受审查、受牵连的干部，公安部内的气氛逐渐和缓，正常的业务工作慢慢开展起来。

会议宣布李震是自杀后，公安部内部没有再生事端。

◇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就是自杀，并建议为他作结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4年1月10日下午，周恩来约华国锋、吴德及吴忠和破案组的人谈话。华国锋向周恩来建议，既然于桑与此无关，应放出来。

周恩来同意后，第二天，华国锋到卫戍区召开破案组和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他将会议地点选在卫戍区，因吴忠是破案组的负责人，破案组会议一般都在卫戍区召开。卫戍区在公安部东门的对面，同在正义路上。

华国锋宣布：“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除刘复之外，其他人都宣布解除审查。”刘复之是华侨，有人说他有海外关系，那时有海外关系就是有特嫌。放刘复之，当时遇到的阻力很大，事情只能一步一步来。

华国锋当场要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人员表态。他先问核心小组的负责人施义之。施是从部队来的，老同志比造反派遵守纪律。施说：“中央站得高，看得全面，我没意见，坚决执行，但要给点时间做思想工作。”

华国锋紧跟了一句：“给一周时间。”随后又说：“你和吴忠一起接于桑出来。”

因为于桑的家就在公安部院里，怕清查的积极分子一时接受不了，再闹出什么事来，有人表示为难。为了便于核心小组做善后工作，大家商定于桑出来后，先在万寿路招待所住几天。

会后，华国锋要施义之和他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汇报，此时已是12日凌晨1时。祝家耀、造反派、部队干部抓住“算旧账”一事不放。为了减少阻力，周恩来说：于桑回部后，你们要抓紧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一是挽救本人，二是教育大家。华国锋也同意这个安排。

13日，吴忠、施义之将于桑接回来，并给他看了周恩来批准的报告。这时，于桑被关了近3个月。于桑回到部里作了检查，那些人仍不放过他，大会小会让他检查。但是他恢复了工作，周恩来指示，他仍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官复原职。周恩来知道自己搞错了，以此表示道歉，承认错误。

刘复之被多关了几个月，但是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他们只好同意放人。1974年底，华国锋做通了吴忠的工作，由吴忠出面在破案组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理由是：隔离久了对他身体不利。华国锋为了不授人以柄，减少阻力，说：解除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暂时不恢复工作。其实这都是经过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周恩来一直很关心这个案子，一直很关心这些人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1975年1月刘复之被放出来了，已被关了15个月。他回来后，公安部内的军队干部、造反派一直不放过他，批判他，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停止。

1974年1月中旬，全国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加上批判周公（影射周恩来）。祝家耀很活跃，不少地方开始明里暗里批周恩来。华国锋告诫施义之：“下面反映来的情况，除了反对毛主席外，反对任何人都不要表态。”不让他们跟着反周总理。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就是自杀，也应为他作一结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3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刘湘屏开会，由华国锋汇报。刘湘屏虽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拿不出“他杀”的证据。这次会议从晚上7点一直开到10点多。为了缓和气氛，会议中间看了半个小时的电影《计划生育》。刘是卫生部长，看这个电影也在她的业务范围之内，可见周恩来用心良苦。

周恩来很慎重，又到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否则江青这些人闹起来，也办不成。

为了做公安部军队干部的工作，3月22日晚9时在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一起找施义之谈话，周恩来亲自做他的工作。此时，距案发已过去了5个月。

刘湘屏和公安部的一些人仍不死心，仍坚持李是被逼而死，一直不同意自杀的说法，因此李震是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就没有作成，直到1977年底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才宣布：李是畏罪自杀。1977年9月12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将在我部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请求报告》，很快中央就批准了。

刘湘屏不仅插手公安部的事，在卫生部也是执行“四人帮”的那一套。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很快撤销了她的卫生部部长一职。

◇ 华国锋回忆：毛主席批评专案组是抓蚂蚁，没有蚂蚁时，什么也看不见；看见了，什么都是蚂蚁。

既然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就得搞出名堂来，搞不出来，江青就施加压力。江青施加的压力可大了，扣帽子、处分、撤职、打倒、下干校、关监狱。这么一来，专案组的逼、供、信就出来了，就用上了，假的东西就出来了，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劳民伤财不说，更重要的是伤害了同志，冤枉了好人，影响团结；特别是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破坏了民主、讲道理的作风。

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以后不允许成立专案组，这点已写进三中全会的公报里。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 原载《党史博览》2013年第10期

~~~~~

## 【亲历者言】

### “文革”从华东局开始的三件史事

• 唐荣智 •

迄今所有的研究，包括纪实文章、学术论文，甚至连有关文件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上海发动的。但我认为是通过华东局发动的。为什么是在华东局？我（原华东局宣传部理论处干事）作为亲历者认为有三点理由，也就是发生在华东局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我要讲的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率先让华东局组织的，而后再到上海市委的。

1963年，俞铭璜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主持工作。他是原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60年11月调来上海。我是1961年2月到华东局报到，报到地点在衡山宾馆，那个时候华东局还没有房子，就在一、二、三楼，宣传部办公占一个楼面。俞铭璜抓工作的时候，理论处就两个人，一个是洪泽，一个是我，洪泽是处长，九级行政干部，省委书记级别的。俞铭璜也是九级，他们两个是老战友，关系非常好，大家都是苏北地区来的，又都是陈老总手下的，俞铭璜是新四军的才子。俞铭璜经常到我们办公室来，一个办公室就这么大，他们两个人讲话我全听得到，他们也不避我。

那一天，俞铭璜来了，他说：老洪，柯老把我找去，说主席要批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要我组织人写文章，我和他们讨论了，出了十个题目，这十个题目可以写成文章，一篇是《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由我来写。还有一篇《评“海瑞罢官”》，我组织姚文元写，另外还有几篇，总共十篇。俞讲到最后说，“《阶级的产生和消灭》这篇文章，小唐啊，你写”。当时我坐在旁边，他不叫我唐荣智，叫我小唐，我当时只有29岁，他当时40多岁。我前几天正好写过一篇文章《阶级的起源》，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是我业余写作投给《解放日报》的，复旦的蒋家俊也写了《阶级的起源》，两篇文章有共同的题目，但各有侧重，编辑找到我说：“你们两个人的文章合起来吧！”就共同署名发表了。俞铭璜肯定是看到了，他说，“小唐，你写过《阶级的起源》，再写阶级的消灭，就是第十篇文章”。俞铭璜就是这样布置下去的，因为他明确说，要批北京市委修正主义的，江青来叫华东局组织写文章。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我们是知道的。但我们不称江青的，叫“客人来了”。

一个礼拜后，俞部长又到理论处来找老洪了，他对老洪说：“今天我放松了，我奋斗了一个礼拜，开夜车，把《有鬼无害论》写出来了，今天早上送《文汇报》了。”后来，《文汇报》就登出来了，用的笔名是“梁壁辉”，不是“俞铭璜”。隔了几天，俞部长的秘书张森昌跑来跟我说：“俞部长的文章稿费来了。”他问俞部长，你为什么笔名叫“梁壁辉”？他说壁辉和铭璜是对称的。当时我们就拜读文章，文章真是写得非常漂亮。（采访者注：据《文汇报》记者郑重在《毛泽东与“文汇报”》一书中的说法：1963年5月6日、7日两天，《文汇报》以几乎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署名“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其实，《文汇报》的人当时就知道，此文为华东局宣传部俞铭璜奉柯庆施之命而写。俞铭璜将文章交给陈虞孙，陈虞孙再交给唐振常，编辑一字未改，全文照发。后来才知道，柯庆施看了俞铭璜的文章，认为写得太学术气了，柯庆施就叫张春桥改。文章写好后，柯庆施说：你们两人合作写的，笔名就叫“两笔挥”吧，后来用其谐音即成“梁壁辉”了。又：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文艺大会上说，它是“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1967年，江青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呵！”）

为了你们的这次采访，我特意打电话向宣传部文教处的张文香核实。据张文香说，俞部长这段时间很怪，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鬼的故事你看过没有？”我说看过的，这个鬼那个鬼讲了一通，李慧娘是鬼。他就问你觉得李慧娘这个鬼怎样，我说李慧娘是好鬼，人中间有好有坏，鬼当中也有好有坏。后来还叫张文香抄稿子，因为张的字很端正。实际上这《有鬼无害论》是十篇文章的第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还没有出来呢。

我的文章写了一个月后交给俞铭璜，一个礼拜后，俞部长到办公室，他不找洪泽，直接找我说：“小唐，文章我看了，前面写得还可以，后面你要改。”我就按俞部长的意见改成第二稿。

又是一个礼拜后，俞部长说：“后面还是要改改。”直至第三稿送上去，好久不见俞部长来，我就去找秘书，秘书说俞部长生病了，在华东医院住院。我到华东医院去看俞部长，俞部长住的是一个人的病房，他一只手按在肝上，原来他得了肝癌，一只手拿着稿子坐在床上改。我看改的正是我的文章，我说，俞部长，你养病要紧，文章还是我来改。于是，俞部长讲了修改的意见：阶级是在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经过若干年以后，要消灭阶级，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条件消灭掉，如果这个历史条件还存在，还会产生新的阶级。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解决了，但阶级产生的条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说分配，有的人利用分配这个环节，多分少分，产生新的阶级。总之，他讲了列宁的观点，要消灭阶级，就要消灭阶级产生的条件。但是，俞铭璜不久就过世了，我的这篇《阶级的产生与消灭》也就搁下了。

这十篇文章中，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俞铭璜组织的。记得我在改文章的时候，俞铭璜就说你要改，姚文元的文章我也看了，也叫他退回去再改。当时根本谈不上张春桥。张春桥实际上是柯老办公室的，柯庆施办公室有四个人，一个楼面四间房间，柯老一间，张春桥一间，蒋文杰一间，他们两个是高级秘书，还有一间是柯老的机要秘书，管文件。华东局成立后，柯老是书记，把蒋文杰放出来了，于是蒋文杰到理论处当副处长，作为洪泽的助手，我在洪泽、蒋文杰的手下当干事。张春桥是高级秘书，是帮柯老起草文件，出点子的参谋。张春桥我不熟悉，只知道他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受到毛泽东重视。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从上海开始的，批判《海瑞罢官》也不是从上海开始的，是华东局柯老着手组织的。柯老兼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包含了上海，但上海不能代表华东局，俞铭璜就不是上海的，他是从江苏来的。由俞来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怎么能说是张春桥组织的？

总之，江青带着毛泽东的意见来找柯庆施。柯老写过《乘风破浪》，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柯老不具体搞理论，搞理论的就是俞铭璜。柯庆施为什么会找俞铭璜？因为柯庆施当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俞铭璜是江苏省委常委、文教部部长兼宣传部长，柯庆施和俞铭璜关系极好。柯老一到华东局当书记，俞铭璜就调来了。俞铭璜组织这十篇文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是历史事实。

姚文元的文章共八稿在那里磨啊，但第一稿是柯老通过俞铭璜布置的，是俞铭璜磨的，不是上海市委讨论的，是由华东局牵头的啊。后来，为什么到上海市委去了呢？柯老叫华东局抓，宣传部长抓，但俞铭璜去世了，那柯老找谁去啊？！谁知柯老不久也过世了。这样就由上海市委来组织了。我的意思，也是史实，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先有江青、柯庆施、俞铭璜起的头，所以华东局是最早的发动地。现在所有的文章，都说江青到上海来找柯老，由张春桥来布置写《评“海瑞罢官”》，这个说法与史实不符。

我要作为当事人，作为历史的证人，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情节。姚文元文章出来的当天，就是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哪里？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不知道，反正是我接的电话，是中共中央打电话给华东局宣传部的，说主席要华东局通知华东六省第二天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于是，我立即报告洪泽副部长。洪部长说与夏征农部长商量后，要我向电话总机通知六省宣传部转接。那个时候没手机的，全是红机子的保密电话。总机通知六省宣传部后，大概10分钟第一个电话来了，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欧阳惠林。我马上叫洪泽部长来听电话，洪泽说：中央通知，今天《文汇报》上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你们省委的《新华日报》明天要保证登出来，明天见报。一个电话结束，这样六个省的电话全是我接的，然后由洪部长电话通知。整整一天，上午布置电话，下午接听电话。下班时，洪部长对我说：明天你到阅览室把各省报纸拿来，你看一看，他们把姚文元的文章登了没有？登在第几版？你再写个简报。第二天上班我到阅览室一份一份核对后，便起草了一个《简报》交给洪部长，洪部长看后交给夏征农签字送书记处魏文伯，魏文伯签发后，再印成简报上报中共中央。关于这个情况，从来没有人讲过，我是经手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个大事，单独借助一个大城市，尽管上海很有典型意义，但它没有腹地，也是不行的。所以华东局六省就为腹地，上海在华东局之内。这样既有柯老，又有腹地，包括上海在内，六省都响应，影响就很大。这是我对史事的分析，后面两件事情也印证了我的观点。

## 二

第二件大事是戏剧革命。

1963年年底，华东搞了华东地区话剧会演。1964年6月，我们接到文化部通知，全国搞京剧会演。所以，1964年6月到8月，华东局组织了一个观摩团，洪泽部长带队，一个文艺处副处长吴伟，就是石西民的夫人，还有我，三人代表华东局宣传部到北京去看长达两个月的京剧会演。我在这两个月里看了六十八场戏，天天看京剧。全国各地的京剧团，有的是正式演出，有的自己带来节目，也要来露一手。江西有个《强渡大渡口》，演出的时候周总理来看。第四排全是给贵宾的，我坐在他旁边，赶快去叫洪部长。演出完毕，周总理、洪部长上台祝贺，周总理还讲了强渡大渡河怎么打法，戏应该怎么改等。

京剧会演结束后，一大批剧目出来了，有几个比较好的，江青就在京剧会演的基础上搞样板戏。1964年8月以后，江青到上海找了柯老。说要搞现代戏，要华东局帮忙，柯老就找了宣传部部长夏征农。夏征农又找洪泽商量。夏征农是有一套想法的，既然柯老要夏征农参加么，夏老就找江青了。江青说：我们要抓现代戏，夏老你来抓。夏老说，上海不大好抓，我抓不动，因为夏是从山东省委书记调过来的，他说上海抓不动，说华东地区那么多剧目，那么多剧团，那么多京剧、戏曲、话剧，我搞普及，你江青同志来抓提高。夏征农就是这样子跟江青讲的，江青非常不开心。结果，江青找柯老提意见，说夏征农不支持，柯老就找了魏文伯，魏文伯就找夏征农谈话，说：你怎么搞的呢，江青同志对你有意见，叫你搞现代戏你不搞。夏征农说不是不帮忙，是不好搞，上海推不动啊。我们搞普及，她搞提高，不是蛮好嘛，普及、提高不是都要搞嘛。这样，江青就找了张春桥。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就是江青到上海来看戏，一个小剧场，除了演出的人，下面看戏的一共十几个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两三个干事，其中有徐景贤，张春桥有时也来。我们华东局这里，夏征农部长，洪泽副部长，带华东局宣传部几个干事都坐在后几排。

华东的京剧会演，我们搞普及嘛。我就跟着洪部长到江苏、安徽等华东六省到处看戏。所以现在讲“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个就是《评“海瑞罢官”》；一个是搞京剧革命，搞现代戏，这两件事情都是从华东局开始的，后来才转到上海。

## 三

第三件大事，就是要打倒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要从上世纪30年代思想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来讲。“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正式文件，应该是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这是正式的中央文件。中央文件下来时，我正在浙江平湖搞“四清”。突然部里来了通知，说外出的干部统统回来，有重大事情要回来参加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回到部里，有一天，通知部里的干部统统开会。当时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凯来传达中共中央文件。这个中央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大概隔了不到十天，中共中央

新发的一个文件——即免除华东局宣传部夏征农部长的职务。文件通知很短的，但中间有一句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夏征农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我是第一次看到中央文件提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以正式的中共中央文件，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全党第一个就是夏征农，就是在华东局。

昨天，为了这次采访，我跟徐扬通了电话。徐扬是华东局宣传部的一个干事，他原来在江苏搞《群众》杂志。他说夏征农100岁的时候，大概2004年了，原华东局宣传部的人为夏老祝寿，那天我没有去，徐扬参加了。本来以为夏老不会来的，100岁嘛，跑不动了，哎，他来啦。来了以后，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人还没讲，夏老自己讲，他说因为今天都是宣传部的人嘛，我不怪大家批判我，打倒我。他说我告诉你们，1965年杭州会议时，主席讲，夏征农不适合做宣传部部长。这个话从来没有透露过。毛泽东讲夏征农不能当宣传部部长，你还当得了？！结果回到上海，魏文伯书记见夏征农，说主席讲，你不好当宣传部部长了，你是不是就不当了？你来当华东局副秘书长。夏老说我不干，我为什么不能当宣传部部长啊，主席也没有讲我有什么问题啊。夏老这个人很硬啊。结果他没下台，一直到《五·一六通知》后来中央文件，还是由周总理签发的，他当然要下台了。

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的初级发动阶段是在华东局。从华东局机关推向华东六省，包括上海市，然后再推向全国。而“文化大革命”在华东局第一个采取组织手段，第一个罢官打倒的就是夏征农，就是华东局的宣传部部长。

□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mailto: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